代际记忆的书写机制：论家族小说的创意写作实践

龙其林

摘要：家族小说是中外文学史上永恒的文学母题，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家族小说的要素在于家族网络、家族人物、家族日常生活，必须同时具备几个要素才能建构典型的家族小说叙事场景。从中外家族小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家族小说的演变与社会变迁存在着内在关联。19 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发生、资本主义崛起，传统家族结构遭遇了重大挑战，这在外国家族小说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而在中国的家族小说中，家族叙事经常与国家命运、政治变迁进行关联，家族成为理解中国政治、社会骤变的一个重要窗口。家族小说创意写作时间中，需留意通过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构全篇，借助家族代际冲突推动情节发展，在特定空间展现家族生活，以此发掘家族秘史。

关键词：家族小说；家族要素；小说谱系；方法论

The Writing Mechanism of Generational Memory: On the Creative Writing Practice of Family Novels

Long Qilin

Abstract: The family novel is an enduring literary motif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works have emerged. The elements of the family novel lie in the family network, family characters, and family daily life; several elements must be present simultaneously to construct a typical narrative scene of the family novel. From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family novel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is an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the family novel and social change.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th the occurrenc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the traditional family structure has encountered major challenges, which is particularly vividly manifested in foreign family novels. In Chinese family novels, family narrative is often linked to national destiny and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become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political and social upheavals. In the creative writing of family novel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tructuring the entire work through blood relations as the bond, to advancing the plot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conflicts, and to displaying family life in specific spaces, so as to unearth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family.

Keywords: family novel; family elements; novel genealogy; methodology

家庭通常指由父母、子女成员构建而成的社会单元，其规模偏小，成员构成亦相对简易。而家族是基于血缘与法律关系，由不同家庭汇聚而成的社会群体。它一般由直系亲属与旁系亲属组成，属于较家庭更为高级的家庭集团。家族成员通常散布于社会各阶层，借助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宗法以及礼教关系，不同家庭构建起一个超脱地域、姓氏与身份的复杂共同体。家族扮演着连接国家、社会与家庭的纽带角色，发挥无形的中介功用。一方面，家族是由具备自然血缘关系的不同家庭所形成的社会群体关系；另一方面，家族又具备内在的利益属性与社会关系属性。基于成员血缘、利益、道德以及法律而形成的家族，具有多重属性。因此，家族小说是指通过两代或两代以上家族成员的经历，展现家族成员与社会、国家、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此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家族兴衰和社会发展、时代巨变之间内在关联的小说。家族小说以家族为核心载体，通过家族成员的经历展现丰富的历史变迁、时代语境和文化内涵。

家族小说主要描述的是某个或某几个家族中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因此，其要素包括家族、人物和日常生活冲突。家族小说的核心要素是家族。在创作家族小说之前，通常需要草拟一份家族人物关系图，以便将不同身份的人物纳入家族关系网络。按照家族人物关系图，可以为错综复杂的群体人物厘清亲疏远近的关系。很多家族小说将家族成员的命运与社会、国家进行关联，借此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变革。家族小说的另外一个要素就是家族内部的不同人物。由于每个人的性格、身份、年龄、观念并不完全相同，这为塑造家族成员提供了契机。如，一个家族内部既有长辈，也有年轻一辈；既有忠厚之人，也有利欲熏心之徒。这些人物的存在，为家族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形象选择，使作品的矛盾冲突更具张力。家族小说的第三个要素是家族内部的日常生活冲突。家族小说通过宗法制度、婚丧礼俗、饮食服饰等细节构建起民众日常生活，一方面借由家族关系网构成复杂的人性试炼场，家族内部的代际冲突、权力倾轧、性别压迫、财产争夺等母题成为剖析人性幽微的绝佳样本；另一方面，家族小说将个体、家庭、家族命运与时代、历史、民族的命运进行了勾连，在日常生活冲突中映照出社会与国家的变迁，在家长里短的故事中完成对历史和文明的审视。

一、他山之石：欧美家族小说的滥觞与谱系

外国家族小说的发生，依据邵旭东在《步入异国的家族殿堂——西方“家族小说”概论》[①]一文中所说，家族小说是从“萨迦”特别是“家族萨迦”发展而来，是“西方家族小说的最早雏形”。萨迦一些家族传奇而闻名，这样 saga 就具有了“世家”的含义家族小说就有了 saga novel 的固定称呼。在古希腊时期，荷马史诗《奥德赛》就已包含了家族叙事的雏形。而《圣经·旧约》中的家族谱系则向人们提供了神圣化家族史的范本。13 世纪前后，冰岛人和挪威人将过去叙述祖先们英雄业绩的口头文学记载成了《萨迦》，五部“萨迦”讲述了家族的兴衰和古代英雄人物的业绩，展现了古代冰岛和挪威特有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人民豪放乐观的精神面貌。18 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的《帕梅拉》关注家庭伦理，多以女仆或中产阶级女性为主人公，善于描写人物情感和心理，但尚未扩展至多代叙事。

① 邵旭东：《步入异国的家族殿堂——西方“家族小说”概论》，《外国文学研究》1988 年第 3 期。

外国家族小说起源于 19 世纪前期，发展成熟于 20 世纪上半叶，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作家、作品。1846 年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一般被视为最早的家族小说，小说描写了两个家族三代人的爱恨情仇。在 19 世纪，西方家族小说还处于形成阶段，主要有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1871—1893 年）、萨克雷的《纽可谟一家》（1854—1855 年）等。进入 20 世纪，家族叙事发展成熟，出现了一批经典之作，有一批作家因家族题材创作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包括德国的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1929 年），英国的约翰·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1932 年），法国的罗歇·马丁·杜·伽尔（《蒂博一家》，1937 年），美国的赛珍珠（珀尔·布克《大地》，1938 年），丹麦的约翰内斯·延森（《希默兰的故事》，1944 年），美国的威廉·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1949 年），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1962 年），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克，怀特（《风暴眼》《人类之树》，1973 年）美籍波兰裔犹太作家辛格（《莫斯卡特一家》，1978 年），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1982 年），埃及的纳吉布·马哈福兹（“开罗三部曲”，《世代寻梦记》，1988 年），西班牙的卡·何塞·塞拉（《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1989 年），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1993 年），日本的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94 年）等。另外还有虽未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声名显著的作家作品，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岛崎藤村的《家》，莫里斯·德吕翁的《大家族》等。

外国家族小说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及现实主义文学兴起存在紧密关联。19 世纪以降，欧洲工业革命推进、资产阶级崛起，使得传统家族结构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民族国家构建进程里，家族叙事常被用以隐喻国家命运，家族史成为洞察社会转型的关键窗口，这使得很多写作者对家族题材怀有特殊偏好。

1. 19 世纪前期：社会转型期的家族矛盾与经济异化

在英语文学世界，被赞誉为第一部具真正意义的家族编年史小说的是爱尔兰女作家玛丽亚·埃杰华斯（Maria Edgeworth）所著家族小说《莱克兰特城堡》[①]（*Castle Rackrent*）。借助虚构家族管家老萨迪口吻的叙事，这部小说幽默且尖锐地将爱尔兰地主莱克兰特家族四代人的兴衰历程予以讲述。通过小说中酗酒、挥霍、法律纠葛以及殖民压迫下的家族命运的呈现，埃杰华斯对 18 世纪爱尔兰地主阶级的腐朽与恋爱关系中的经济剥削予以揭露。同时，这部作品以微观家族史映射爱尔兰在殖民统治下的集体创伤，成为 19 世纪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先声。这部小说中独特的不可靠叙事手法与地域现实主义风格，对后续司各特、萨克雷等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1834 年，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创作了长篇小说《高老头》[②]。小说讲述了 19 世纪初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巴黎面粉商人高里奥通过投机倒把，积累了巨额财富。妻子去世后，高里奥视两个女儿为心肝宝贝。他竭尽全力地培养、教育两个女儿，为她们提供贵族教育。在两个女儿出嫁时，高里奥又奉上了昂贵的嫁妆。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两个女儿嫁入上流社会后，她们对父亲高里奥却变得冷淡起来。她们的亲情观念逐渐被金钱所扭曲，见父亲失去了利用价值后不愿和他往来。

① 〔爱尔兰〕Maria Edgeworth：*Castle Rackrent*，陈恕主编：《爱尔兰文学作品选读》，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年。

②〔法〕巴尔扎克：《高老头》，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

高老头在孤独与贫困中死去，两个女儿拒绝出席父亲的葬礼。通过高里奥这个老父亲的凄惨遭遇，小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导致的亲情和人性的异化。

2. 19 世纪中期：代际循环中的家族宿命反抗

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长篇小说《呼啸山庄》[①]（*Wuthering Heights*）是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家族小说，作品通过房客洛克伍德的视角，讲述了两代人的爱恨情仇。主人公希斯克利夫曾是一名吉普赛孤儿，后来被山庄老主人收养，并且与其养女凯瑟琳建立亲密关系。两个年轻人尽管感情炽热，对对方都有好感，但是凯瑟琳最终还是嫁给了富有的埃德加·林顿。希斯克利夫在失去凯瑟琳后由爱生恨，开始了自己的疯狂复仇。他不仅对凯瑟琳的家人进行折磨，借此让她深陷痛苦之中，而且还将仇恨延到下一代，让两个家族的成员都充满了对于可能遭受的厄运的恐惧。这部小说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常见的温情脉脉的家庭叙事习惯，作家通过狂暴的自然力量和扭曲的人性，对爱情与仇恨、个体与阶级、复仇与救赎等多重主题进行探讨。

俄罗斯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②]将 1812 年的俄法战争作为背景，通过四大贵族家族的命运来映射重大历史事件，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皮埃尔·别祖霍夫秉性真诚善良，历经战争磨难以及人生波折起伏之后，成长为一位富有责任感的成熟男性。身为军官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内心渴慕于战争之中探寻自我价值，然而最终却在战场上负伤，并陷入痛苦的自我审视。娜塔莎·罗斯托娃作为充满激情的年轻女子，于追求爱情以及自我认知的进程里持续成长。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反复呈现家族宴会场景、战场拼杀画面，借由杀与哲学思辨的场景探讨了自由意志与宿命论的冲突。

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借由家庭生活描绘，映射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的巨变，以及道德伦理和价值标准所历经的重要转变。《布登勃洛克一家》是托马斯·曼的作品，小说以家族四代人兴衰为叙事脉络，展现了彼时德国社会的变迁。

3. 20 世纪上半叶：现代性、战争与家族史诗重构

20 世纪上半叶外国家族小说步入繁荣阶段。《福尔赛世家》[③]（*The Forsyte Saga*）是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作品，被认为是 20 世纪极富影响力的家族小说系列之一。这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式巨著，以伦敦上层中产阶级的福尔赛家族作为核心聚焦点，借由三代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对维多利亚晚期直至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予以生动入微的刻画。1886 年，建筑师菲利普·波辛尼与伊琳的婚外情事件成为小说叙事的导火索，这一事件揭露了福尔赛家族成员对于财产与体面的病态执着。索米斯·福尔赛作为核心人物展现出极强的占有欲，他竟将妻子伊琳视作收藏品。随着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新一代福尔赛人对这种令人窒息的传统生活展开反抗，画家乔恩与芙蕾的禁忌之恋象征着新旧价值观之间的激烈碰撞。约翰·高尔斯华绥运用现实主义的细腻笔触，将家族故事与英国历史上的布尔战争以及妇女选举权运动进行巧妙交织。1932 年，约翰·高尔斯华绥凭借这部家族

①〔英〕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张玲、张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

②〔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

③〔英〕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周煦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年。

小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布登勃洛克一家》[①] 自出版后受到评论界的一片好评，被评论家认为是 20 世纪世界家族小说中独具特色的作品。在 19 世纪德国的吕贝克城里生活着布登勃洛克家族，他们四代人在此生活和工作。约翰·布登勃洛克是家族的第一代人，为了提高家族的生活水平，他投身于谷物贸易经营，赚取了巨额财富，也为家族打下了声望。约翰·布登勃洛克的儿子小约翰虽然缺乏魄力，但还能够守护家业。到了孙子托马斯时，他虽然具备过人的才华，但却在追求商业利益与艺术素养的冲突中走向消沉。到了家族的第四代汉诺时，布登勃洛克家族的生命力已经彻底衰退。汉诺敏感且忧郁，他对音乐十分痴迷，却没有实干能力，最终早早离世。托马斯·曼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象征手法，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物质丰富与精神空虚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聚焦。这部小说既可以看作是一部家族的编年史，又可以视为一部预言欧洲现代性及其负面后果的作品。1929 年托马斯·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凭借的就是这部小说。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所著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②]（*The Sound and the Fury*）以美国南方已然没落的康普生家族作为核心，借由四个呈现断裂状态的叙事视角，展现了这个家族在 20 世纪初始时期遭遇的精神瓦解进程。这部小说围绕康普生家族长女凯蒂·康普生未婚先孕、被迫成婚而后又遭抛弃的堕落经历铺陈开来。面对此场灾难，她的三个兄弟回应方式各异。智力存在障碍的班吉，凭借感官记忆执着追寻凯蒂的气味，将其视作情感寄托。身为哈佛学生的昆汀，因难以承受妹妹失贞致使南方传统荣誉观念破灭的冲击，最终投河自尽。愤世嫉俗的杰森则沦为金钱的奴役，他对凯蒂私生女小昆汀展开了残酷压榨。最终，小昆汀偷走杰森积蓄与人私奔，完成对这一腐朽家族的最终复仇。在这部家族小说中福克纳开展了具有革命性的叙事实验，小说前三个部分分别从班吉、昆汀以及杰森的主观视角予以叙述，而第四部分以黑人女仆迪尔西的旁观视角来讲述这个家族的悲剧故事。康普生家族的衰败灭亡，成为福克纳笔下南方传统走向解体的经典寓言。由于这部家族小说对于美国南方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描写，1949 年威廉·福克纳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4. 20 世纪下半叶：全球化时代的家族史诗

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家族小说不再将囿于描写单一家族的兴替轨迹，而表现出对种族、性别、殖民以及记忆等全球性论题的兴趣。美洲的家族小说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态势崭露头角，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这类作品讲述了美洲的风云变幻与历史演进的关系。在小说中，家族既是因奴隶制、战争等因素给民众造成巨大创伤的受难者，同时也是重建归属感的期望所在。

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③] 讲述了马孔多小镇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向读者展现了哥伦比亚百年历史。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不仅名字隔代重复出现，而且命运也颇为相近。家族第一代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具有很强的创造力，最后却因精神失常被绑在树上度过余生；乌尔苏拉是家族中的女性支柱，不仅长寿，而且性格坚韧，

①〔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傅惟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年。

②〔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

③〔哥伦比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黄锦炎、沈国正、陈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办法阻止家族的衰败。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不断地上演着兄弟反目、近亲通婚、精神疾病、权力斗争、情欲纠葛的故事，形成了一种荒诞悲凉的氛围。马尔克斯将现实、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加以杂糅，创造了一个魔幻性的小说世界。加西亚·马尔克斯于 1982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根》[①]（*Roots：The Saga of an American Family*）这一部纪实小说由美国作家亚历克斯·哈里（Alex Haley）创作，作品凭借家族口述史以及档案研究作为线索，借七代人的命运对非裔美国人自非洲部落至奴隶制解放的苦难历史加以再现。在西非冈比亚，曼丁哥族的少年昆塔·金特在狩猎训练之际遭白人奴隶贩子掳掠，历经残酷航行，抵达美国弗吉尼亚种植园。昆塔数次逃亡皆未成功，被砍去半只脚掌，最终妥协并育有女儿吉西。吉西被售卖至另一庄园，其儿子鸡乔治因具备斗鸡技能获短暂优待，然而家族为奴命运依旧未改。南北战争结束后，金特家族后代汤姆成为铁匠，引领家人迈向自由。作品末尾，阐述哈里本人经由非洲口述史官引导，确认昆塔·金特真实存在，进而实现跨越两百年的身份重构。这部小说出版后，引发了全球性的寻根热现象。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②]以 16 世纪奥斯曼帝国为背景，通过一桩宫廷画师谋杀案，串联起一个充满艺术信仰与家族秘密的史诗故事。1591 年，细密画大师高雅先生被残忍杀害，尸体被抛入深井。他的姨父委托外甥黑——一名流亡十二年归来的青年——调查此案。黑重逢姨父之女、自己昔日的恋人谢库瑞，两人在谋杀阴影下重启情感，而谢库瑞的丈夫恰在战场失踪，使关系更趋复杂。随着调查深入，黑发现有四位细密画师具有嫌疑：画师“橄榄”坚守传统波斯画风，抵制欧洲透视法；画师“鹳鸟”狂热追求个人风格，为此不惜作弊；画师“蝴蝶”在宗教戒律与艺术自由间挣扎；画师“缎子”则是隐匿的异端者。经过黑的调查，凶手橄榄最终浮出水面：他之所以杀害高雅先生，只为阻止奥斯曼细密画受威尼斯肖像画“污染”。小说章节以“红”色、金币、树、死亡等非人角色独白展开，拼贴出谋杀案的真相，这种手法将艺术、宗教与家族伦理浓缩为一场关于“观看方式”的哲学辩论。2006 年，帕慕克因该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二、家国同构的书写传统：中国家族小说的源流与嬗变

我国古代第一部成熟的家族小说是 17 世纪上半叶诞生的《金瓶梅》，作者一改宋元以降《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等英雄传奇家国恩怨裹挟的宏大家族叙事，转向对日常生活细节、场景的细腻描绘。小说描写了身兼富商、官僚、恶霸多重身份的西门庆家族的复杂家庭争斗和琐细市井生活，展现了晚明官场和市井社会的众生相以及家族的兴衰。《金瓶梅》之后，内写家族，外写世情的还有《玉闺红》《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歧路灯》《蜃楼志》《红楼梦》等创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林兰香》和《红楼梦》。《林兰香》主要写明初贵族后裔耿郎一家的兴衰荣枯及矛盾纠葛，故事从明洪熙元年写到嘉靖八年，时间跨度一百余年，从不同侧面真实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社会征象。作者不仅描述了耿家的衰败，还剖析了原因，认为勋旧之家“自赫奕至衰微”，是其“子孙习安好逸”的结果。其挽歌式的悲叹，

①〔美〕亚历克斯·哈里：《根》，郑惠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年。

②〔土耳其〕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对《红楼梦》的创作很有影响。

1. 明朝中后期：世俗生活为核心的世情小说

明朝中期兰陵笑笑生的长篇小说《金瓶梅》[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世俗家族生活为核心的世情小说，作品通过暴发户西门庆家族的兴衰，展现了明代商业社会中的欲望、权力与道德崩塌。西门庆原本是开生药铺的市井之徒，凭借贿赂、联姻和官商勾结，迅速积累财富与权势，成为清河县恶霸。小说书名中的“金（潘金莲）”“瓶（李瓶儿）”“梅（庞春梅）”象征家族内女性的欲望与悲剧，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潘金莲毒杀武大郎后嫁入西门家，与李瓶儿争宠，最终导致李瓶儿之子官哥儿夭折，家族内部陷入疯狂倾轧。西门庆纵欲暴亡后，正妻吴月娘无力持家，家产被仆人侵占，儿子孝哥出家，庞春梅淫乱而亡，西门家族彻底败落。西门庆的崛起反映了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传统道德的瓦解，权力与性成为交易工具。《金瓶梅》开创了家族衰亡叙事的先河，其写实手法直接影响《红楼梦》。

明末清初之际，署名“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②]通过因果报应结构讲述了一个横跨两世的家族复仇故事。山东武城县的纨绔子弟晁源迷恋小妾珍哥，纵容她虐待、诬陷正妻计氏，最终导致计氏自缢身亡。晁源也曾射杀灵狐，为后世的冤冤相报埋下了伏笔。晁源死后转世为狄希陈，娶了灵狐转世的薛素姐，薛素姐对丈夫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她不仅用针刺、火烧、囚禁等方式虐待狄希陈，而且当众羞辱，逼其穿女装，甚至险些将他活埋。后来狄希陈又续娶计氏转世得童寄姐，依然家宅不宁，最后只好出家赎罪。在《醒世姻缘传》中，晁源虐待正妻、射杀灵狐，导致家族衰败；狄希陈不仅子嗣艰难，家族血脉濒临断绝，而且夫妻内斗、官司缠身，导致狄家彻底败落。这部家族小说通过男性被女性暴力报复的极端情节，颠覆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同时又以佛教轮回观解释家族悲剧，反映了明末清初社会对于当时社会道德溃败的急切焦虑。

2. 清朝中前期：中国古代家族小说的艺术高峰

在清代，《红楼梦》[③]借四大家族之兴衰，将家族命运与国家、政治命运的内在联系予以揭示，堪称中国古代家族小说艺术造诣的巅峰。这部由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借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的命运遭际，呈现贾、史、王、薛四个大家族的兴衰态势。《红楼梦》凭借细腻入微的日常生活描摹以及宏大壮阔的叙事格局，把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广泛存在于伦理道德、家族制度与人性追求间的冲突予以揭示。贾府作为小说故事核心场景，富贵气象如钟鸣鼎食般彰显，却也隐匿危机。贾母作为贾府的老祖宗，拥有颇高人生智慧与处世经验，然而面对家族颓败之势，除管教与呵斥，亦无他法。贾政言行举止极为谨严，乃儒家伦理之恪守者，可即便如此，恪守道德规范仍难以挽回贾府整体走向衰败的命运。至于贾赦、贾珍等纨绔之辈，无疑加速了贾家的堕落进程。

在清朝乾隆时期，李绿园所创作的《歧路灯》[④]是一部以教育救家作为主题的家族小说。作家借由浪子回头这样的故事，对封建社会里家族延续方面所存在的道德困境以及儒家理想予以展现。河南祥符县的书香子弟谭绍闻，幼年便遭遇丧父变故。虽说他得到母亲王氏与师长的教诲，然而

①〔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②〔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长沙：岳麓书社，2014 年。

③〔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

④〔清〕李绿园：《歧路灯》，北京：金城出版社，2000 年。

却因交友不慎，逐渐走向堕落，沉溺于赌博以及狎妓，最终将家产消耗殆尽。谭绍闻背负巨额债务，无奈被迫卖地典屋，甚至做出盗用母亲首饰之举，致使家族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仆人纷纷叛离，亲友亦逐渐疏远。其妻子孔慧娘具备贞静贤淑品性，却不幸因病过早离世。在此之后，谭绍闻痛改前非，选择闭门读书，后来他和儿子一起赴考并得中副车，而儿子后来更是中了进士，实现了重振家业的目标。《歧路灯》着重强调守业相较创业而言更为艰难，小说将家族的兴衰与子弟教育紧密联系起来，充分体现出儒家“修身齐家”的理想。当《红楼梦》等作品凭借渲染家族衰亡的悲剧故事时，实际上这部小说提供了另一种家族救赎的叙事可能性。

3.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兴起

20 世纪上半叶，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迎来了现代家族小说的第一个繁荣期。自 1918 年鲁迅《狂人日记》发出“暴露宗法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呐喊，之后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老舍的《四世同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爱玲的《金锁记》、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多部优秀家族小说相继涌现。中国现代作家对家族题材的热衷，一方面，由于“家族”作为一个以地域性、血缘性、人情性为纽带的历史文化复合体，其本身就包含着人物关系的复杂性、结构组织的繁复性、时间和故事生成的多样性和自足性、叙事行为的自发性以及讲述形式的多样性，本身就具有文学叙事的“潜文本”或“原文本”的形态特征。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外家族叙事文学的影响与刺激。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是中国现代家族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的家族小说既延续了古典家族叙事的某些传统，又融入了现代思想与现实主义手法，成为反映社会变革、批判封建制度的重要文学载体。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包括《家》[①]《春》[②]《秋》[③]，小说以成都高家四代人的命运为脉络，展现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与青年一代的觉醒。《家》聚焦高家三兄弟的成长与抗争。长子觉新受新思想影响却屈从于家族安排，被迫与表妹梅芬分离，另娶瑞珏，最终因封建礼教间接导致梅芬病逝、瑞珏难产而亡。三弟觉慧在“五四”思潮影响下，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目睹婢女鸣凤被祖父高老太爷强嫁给冯乐山做妾后投湖自尽，最终毅然离家出走。《春》延续《家》的悲剧主题，聚焦的对象却换成了高家女性的命运。淑英与蕙均被父亲许配给品行恶劣的男子，蕙逆来顺受，婚后病逝；淑英在觉民、琴等人的帮助下逃往上海，获得新生。《秋》描绘高家彻底衰败的结局。克明死后，克安、克定公开纳妾宿娼，克定之女淑贞不堪逼迫自杀，高公馆被变卖，家族成员分崩离析。觉新逐渐摆脱“作揖主义”，支持弟妹反抗；觉民与琴结婚，象征新生活的开始。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与生动的情节冲突，展现了封建制度下人性的挣扎与觉醒，揭示了封建宗法制度的腐朽本质和革命潮流对旧秩序的猛烈冲击，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控诉封建礼教、呼唤自由民主的经典之作。

张恨水的家族小说《金粉世家》[④]以民国北洋时期北京城为舞台，通过国务总理金铨家族的兴衰与七少爷金燕西、寒门才女冷清秋的爱情悲剧，展现权贵阶层的奢靡堕落与新旧时代的碰撞。风流倜傥的金燕西偶遇清丽孤傲的冷清秋，以诗歌、

① 巴金：《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

② 同注①。

③ 同注①。

④ 张恨水：《金粉世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

金钱与浪漫追求打动芳心，二人冲破阶级差异结为夫妻。婚后的燕西暴露纨绔本性，与交际花白秀珠旧情复燃，冷清秋在绝望中携子出走。金家子女挥霍无度， 大少爷沉迷女色，三少奶奶红杏出墙，大小姐骄纵虚荣，现代社会的封建大家族展现出畸形生存的面貌。国务总理金铨猝死后，金家内斗分产，迅速败落。最后金家遭遇一场大火，金宅焚毁，金粉世家的虚幻繁华终成灰烬，一个旧式贵族大家族重要走向衰败。

茅盾的长篇家族小说《子夜》[①] 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为背景， 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家族的兴衰，展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民族工业的悲剧性命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家族企业为轴心的社会分析小说。吴荪甫是上海裕华丝厂的老板，野心勃勃地试图振兴民族工业。他兼并小厂、成立信托公司，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展开激烈竞争，试图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杀出一条血路。但是吴荪甫的姐夫杜竹斋临阵倒戈，妻子林佩瑶精神空虚，弟弟阿萱沉迷享乐，家族成员无法形成合力。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联合外资势力对吴荪甫进行金融围剿，加上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吴荪甫逐渐陷入困境。在多方力量的夹击下，吴荪甫资金链断裂，信托公司破产，裕华丝厂被吞并，最终他携妻子离开上海，民族工业梦彻底破碎。吴家不仅是商业家族，更是旧中国社会结构的缩影，其瓦解象征传统生产方式的没落。吴荪甫的失败揭示了在半殖民地社会，民族资本家的努力注定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扼杀。

4.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国家族小说日趋式微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随着政治体制与文化思想的变化， 中国当代家族小说日趋式微。这一阶段中国当代文学承担了描绘革命胜利、展现光明战胜黑暗的政治使命，仅出现了《红旗谱》《三家巷》等为数不多的带有家族特征的小说。这类小说将家族之间的故事演化为阶级对抗和革命叙事，体现了革命与文学合目的性的表述。这就与一般狭义的家族小说有了较为明显的区别。

梁斌的长篇家族小说《红旗谱》[②] 以冀中平原锁井镇朱、严两家三代人的命运为主线，展现从清末到抗战初期农民阶级的觉醒与革命斗争。朱老巩为保护象征土地权的铜钟与地主冯兰池拼命，吐血身亡，其子朱老忠流亡关东，家族仇恨由此埋下火种。朱老忠壮年之际携家带口返乡，与严志和等贫农结盟，在共产党员贾湘农引导下， 参加反割头税运动，从自发复仇转向有组织的革命。朱老忠等领导农民暴动，家族仇恨逐渐升华为阶级解放事业。这部小说将传统家族恩怨融入宏大历史进程，开创了革命家族小说的范式。朱家从为家族复仇到为阶级斗争的转变，诠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必然性。

欧阳山的长篇家族小说《三家巷》[③] 以 20 世纪 20 年代广州城三家巷内毗邻而居的周、陈、何三大家族为叙事中心，通过三家年轻一代在大革命洪流中的不同人生选择，展现了阶级分化与革命斗争的社会画卷。工人家庭出身的周炳与买办资产阶级家庭的表妹陈文婷青梅竹马，却因阶级立场差异渐行渐远，后来周炳与工人女儿区桃产生了真挚爱情，区桃在沙基惨案中牺牲催生了周炳革命意识的觉醒。陈家公子陈文雄表面进步实则投机，最终背叛革命，何家少爷何守仁则彻底站在反动阵营镇压工农运动。小说以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三家青年在时代巨变中的命运分野——周炳投身革命、陈

① 茅盾：《子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

② 梁斌：《红旗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

③ 欧阳山：《三家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

文婷妥协沉沦、何守仁顽固反动，深刻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阶级关系的本质矛盾，同时以细腻笔触描绘了岭南地域风情，将家族恩怨升华为对中国革命必然性的文学诠释，塑造了周炳从淳朴青年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典型形象，使这部作品成为兼具革命史诗气质和浓郁地方特色的红色家族小说典范。

5.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家族小说复兴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反思的出现，家族小说也迎来了复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张炜的《古船》《家族》、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秦岭记》、张洁的《无字》、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家族小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道靓丽景观线。

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①]以家族史诗的方式书写了 20 世纪中国民间苦难历史，揭示了历史的荒诞性与人性的复杂性。小说以母亲上官鲁氏为核心，通过其生育的八女一儿及其社会关系，构建了独特的家族叙事。上官鲁氏因丈夫性功能障碍，被迫与姑父、土匪、传教士等八名男性发生关系以延续子嗣。女儿们长大之后分别嫁给归属于土匪、国民党、共产党等不同政治阵营的对象，她们的命运沉浮构成家族与时代共振的微观样本。上官鲁氏以“丰乳肥臀”哺育家族，用胃袋偷食反刍喂养子女，展现了普通女性伟大的母性精神和对历史苦难的勇敢担当。

王旭烽的长篇家族小说“茶人三部曲”由《南方有嘉木》[②]《不夜之侯》[③]《筑草为城》[④]三部长篇小说组成。作品以杭州忘忧茶庄杭氏家族五代人的命运沉浮为主线，贯穿从太平天国运动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百年历史，通过茶叶世家的兴衰荣辱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韧性与精神品格。《南方有嘉木》聚焦清末民初杭九斋、杭天醉父子在乱世中坚守茶业却难逃家族悲剧。《不夜之侯》描写抗战时期杭家儿女以茶为武器进行文化抗争，第三代杭汉在战火中守护茶文化血脉。《筑草为城》则讲述新中国成立后杭家后人在政治运动与商业浪潮中对茶道的坚守与创新。“茶人三部曲”将茶道精神与家族史诗相融合，以茶为文化基因，通过采茶、制茶、品茶的精细描写隐喻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困境，塑造了杭天醉、杭嘉和等兼具文人风骨与民族气节的人物群像，在家族叙事中寄寓对中华文化命运的深刻思考。

在长篇小说《秦腔》[⑤]中，贾平凹将自己的故乡棣花街作为原型，通过清风街近二十年的变迁展现了乡土中国在时代浪潮中的剧烈转型。清风街上的夏家是传统乡村家族的缩影。以夏天义、夏天智为代表的老一辈成员坚守家族文化和传统规范，努力维系家族的团结。但是夏家的第二代受到商品经济影响，与老一辈产生了激烈的观念冲突，家族出现分化，子女不孝、兄弟失和的现象逐渐显现。小说在日常生活细节中展现了传统家族文化的解体，揭示了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对家族传统文化的致命影响。

从个人体验、感悟与认知出发，一些作品借由家族小说对社会想象及历史见解予以表达，敏锐捕捉到那些尚处未定型状态的历史存在。中外

① 莫言：《丰乳肥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 年。

② 王旭烽：《南方有嘉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

③ 王旭烽：《不夜之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

④ 王旭烽：《筑草为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

⑤ 贾平凹：《秦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

家族小说的文化背景与发展阶段各异，然而均以家族命运映照时代精神，家族小说成为一种可跨越时代且超越国籍的创作母题。

三、真实与想象的边界：家族小说创作的方法论建构

家族小说的创作，一方面要求对家族成员命运、复杂人性及错综关系展开精细刻画；另一方面，作者应该针对社会剧变、民族命运以及国家历史深入思考。借助血缘关系作为纽带以架构全篇，凭借家族代际冲突促使情节演进，通过特定空间呈现家族生活，以及经由家族经历挖掘家族秘史，成为最为常见的家族小说创作的方法与技巧。

1.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构全篇

家族得以形成，最核心的要素是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一个家族中最核心、最内在的纽带，它串联起不同社会阶层、地域、行业的家庭成员。因此，在创作家族小说时，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构全篇，构建起支撑叙事的情感张力场；同时，可以运用血缘传承中的显性特征（如遗传疾病、特殊胎记）或隐性特质（如性格禀赋、职业选择）作为叙事伏线，使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转化为文学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此外，可以将重大历史事件对家族的血缘冲击（如战争导致的离散、移民引发的混血）作为情节转折点，以此实现家族史与民族史的深层互文。这种创作方法既能保持家族叙事的生物逻辑真实感，又能通过血缘关系的延展性，将个体命运自然融入更广阔的社会变迁图景之中。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①] 讲述了马孔多小镇上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故事。这个家族习惯给后代起名为阿尔卡蒂奥和奥雷里亚诺，在不同时期的家族成员中这两个名字不断出现，仿佛历史始终处在循环状态。在布恩迪亚家族中，家族中每一代、每一个成员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家族基因的载体，他们的命运轨迹与家族宿命之间形成了互文关系。《百年孤独》中的男性成员始终在何塞·阿尔卡蒂奥与奥雷里亚诺两个名字间交替，初代何塞因痴迷科学走向疯癫，次子奥雷里亚诺上校发动 32 场起义终归虚无，第三代何塞·阿尔卡蒂奥因暴力统治被枪决，第六代奥雷里亚诺破译羊皮卷后目睹家族覆灭。小说中的女性虽然没有重复命名，但也具有乌尔苏拉的坚韧与阿玛兰妲的孤独特质，这种命名机制使每个新生命从诞生起便背负着先祖的命运。

在小说中，近亲通婚的诅咒贯穿家族血脉的始终。初代何塞与表妹乌尔苏拉因近亲恐惧推迟房事，最终仍生下健康子嗣。但第六代奥雷里亚诺与姨妈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结合后生下了长着猪尾巴的第七代婴儿，预言中的怪胎被蚂蚁吞噬，彻底终结家族血脉。这种生物学禁忌与魔幻现实的交织，暗示着血缘纯净性的悖论。当家族中的人们越是试图规避近亲诅咒，他们越有可能深陷命运旋涡难以自拔。布恩迪亚家族在香蕉公司大屠杀、四年暴雨、飓风抹除马孔多等事件中加速崩塌，但血缘纽带始终是牵引悲剧的核心力量。当第七代婴儿的啼哭声与蚂蚁啃噬声同时响起，羊皮卷上“家族的第一个人被绑在树上，最后一个人被蚂蚁吃掉”的预言终于应验，血缘关系完成了从创世到灭世的闭环。这种对家族命运的魔幻书写，使《百年孤独》超越地域限制，成为人类文明的终极寓言。家族中血缘关系的存在，使《百年孤独》将家族故事呈现为树状分支结构，每个家族成员各有其独立的命运发展，但从整体上看又是一个家族命运的缩影。

①〔哥伦比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黄锦炎、沈国正、陈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

在老舍所著《四世同堂》[①]里，作家借由对北平小羊圈胡同祁家四代人生活情形的刻画，呈现出抗战时期普通民众所面临的命运状况。祁老太爷作为祁家四世同堂体系中的核心人物，亦是全胡同年岁最为年长者，其性格展现出倔强之态，为人秉持正直之念，在涉及国家民族、大是大非的关键节点之际态度坚决毫不含糊。祁天佑身为祁老太爷之子，天性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纯然，却因遭受来自日本人的羞辱，最终选择投河自尽这一悲剧结局。祁天佑这一脉育有三个儿子，其中身为长子的祁瑞宣，职业是中学英语教师；次子祁瑞丰，在人生道路上不幸沦为汉奸；三子祁瑞全，则毅然成为抗日战士。这部小说对处于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域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呈现，反映出他们从最初偷生苟安的状态逐步发展至觉醒反抗的这一过程。

路翎的长篇家族小说《财主底儿女们》[②]以血缘关系为叙事骨架，通过苏州蒋氏家族三代人的血脉勾连与精神传承，构建起一部荡气回肠的家族史诗。作为家族核心的蒋捷三以封建家长的绝对权威维系着血缘共同体，其长子蒋蔚祖的懦弱无能暗示着嫡长子继承制的腐朽基因，次子蒋少祖的改良主义思想彰显了血缘纽带在现代思潮冲击下的裂变，而最具反骨的三子蒋纯祖则以决绝的革命姿态完成了对血缘桎梏的叛逆，这三条血脉分支恰似染色体螺旋般缠绕出家族命运的遗传密码。小说刻意强化血缘的显性表征，蒋蔚祖继承父亲的面容却未能承继其威严，蒋少祖延续家族的学识却背叛了其内核，蒋纯祖虽在精神上弑父却始终带着蒋家特有的敏感气质，这种血脉传承中的变异与守恒构成了叙事的内在张力。蒋蔚祖发疯标志着血缘理性的崩塌，蒋少祖的政治妥协导致血脉理想的异化，蒋纯祖的战时流浪则使血缘网络彻底碎片化，最终老太爷的死亡宣告了血缘共同体的解体。而蒋家女儿们嫁入不同阶级所衍生的姻亲关系，则如同基因重组般拓展了血缘叙事的社会维度，特别是蒋秀菊与工人家庭的结合，暗示着新的血缘政治正在战火中孕育。路翎将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转化为文学叙事的结构法则，使蒋家儿女们的每一个抉择都既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又是家族基因的表达，让这部作品成为解剖中国社会血缘文化基因的文学显微镜。

2. 以家族代际冲突推动情节发展

传统家族通常包含三到五代人。在一些家族的族谱记载、祭祀活动以及日常交往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一些延续了数百年的大族，有可能包含更多代人。不过，在当代社会五代甚至更多代同堂的情况较少。但无论家族规模如何变化，一个家族由两代或两代以上成员构成的性质依然适用。家族既然由两代或以上成员构成，那么不同代际必然存在着差异。

家族内部的代际差异构成了家族小说的重要矛盾。家族两代人或多代人之间，由于地位、身份、阅历、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差异，或是由于思想、认知的不同，不同代际在处理婚姻关系、职业规划、人情往来、社会定位、价值观念等方面可能存在着矛盾。

在家族内部成员间，代际冲突经常充当人物成长的一种促发要素。人物在家族代际冲突这一情境中，常置身复杂状况，这些复杂状况往往致使其性格弱点得以暴露。当家族小说里的人物察觉到自身不足时，其潜在能力便有被激发的可能性，从而为人物成长指明方向。家族内部的冲突，经常源自新旧两代观念上的分野，年轻一代为践行自身理念，会尝试冲破传统行为模式的拘囿。贾府作为《红楼梦》里规模庞大的封建家族，两

①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

②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

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对情节演进起到了推动作用。《红楼梦》中，贾母、贾政等老一辈人物深受封建礼教濡染，将“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视作准则。贾府的老一辈人希望年轻一代能够继承家族的荣耀，重振家族声威。贾政是典型的封建礼教卫道士，他时刻以儒家伦理道德要求子女。老一辈人非常重视家族利益和门第观念。贾母为了维护贾府的家族利益，将贾元春送进皇宫成为皇妃。在贾宝玉的婚姻问题上，贾母和王夫人等老一辈人倾向于选择薛宝钗。薛宝钗性格温顺，符合封建礼教对媳妇的要求，而薛家与贾家通过联姻更能巩固关系。贾政希望贾宝玉能够走仕途光宗耀祖，但贾宝玉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 父子之间常常产生冲突。在贾宝玉与忠顺王府的戏子蒋玉菡交往密切时，贾政认为这有违封建礼教，对贾宝玉大打出手，企图用暴力手段让儿子回归正道。而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对封建礼教逐渐产生了怀疑和反抗。贾宝玉厌恶仕途经济，认为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是国贼禄鬼，他反而渴望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与丫鬟们相处时毫无主仆之分。贾宝玉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喜欢诗词歌赋，享受与姐妹们吟诗作画的诗意生活。贾宝玉和林黛玉相互倾心，但是这段感情遭到了老一代的反对，林黛玉得知贾宝玉与薛宝钗成婚的消息后含恨而死。在封建大家族中，婚姻由家族利益决定并为家族利益服务。贾宝玉和林黛玉尽管真心相爱，却无法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他们的爱情悲剧是对封建礼教束缚爱情自由的强烈批判，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必然性，其中家族成员代际的冲突为故事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动力。

家族内部不同代际的成员受到不同时代思潮、文化观念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家族成员代际的矛盾，为人物性格的展现提供了具体情境。巴金在长篇小说《家》[①] 中讲述了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大家长和以觉慧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之间的冲突。高老太爷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经常用三纲五常等传统道德观念教育子孙。觉慧受新思想影响，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对封建礼教采取批判态度，因此双方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高老太爷严禁子孙参加社会活动，认为这会破坏家族声誉，偏偏觉慧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渴望通过努力改变社会。高老太爷一生都在努力维护家族利益， 希望子孙们能够遵循传统，觉慧却力图摆脱封建家族束缚，去追求新的生活和自由。高老太爷认为婚姻应该由家长做主，以家族的利益为出发点，而觉慧反对包办婚姻，不仅支持觉民逃婚追求自由恋爱， 而且自己也想与家中丫鬟鸣凤自由相爱。正是由于高老太爷和觉慧围绕着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冲突，他们的性格才得到了鲜明展现。

家族内部存在着不同代际的成员，他们之间因为思想观念、价值利益等因素的差异，经常爆发矛盾冲突，而这些矛盾冲突又经常受国家政策、社会阶段、政治形势的影响，因此通过对于家族内部代际的矛盾冲突的书写，家族小说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社会风貌、民众观念。阿来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②] 以川西藏区麦其土司家族内部的代际冲突为线索，揭示出这个封建吐司家族如何在历史变革中走向灭亡的过程。小说中的二少爷是个傻子，小说通过他视角来看到家族内部代际的矛盾冲突，老麦其土司秉持传统统治方式，而长子旦真贡布受过现代教育，对改革吐司制度心怀渴望。老土司与长子之间因理念冲突，在家族究竟应该种植罂粟还是种植粮食的问题上爆发了激烈冲突，于是直

① 巴金：《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

② 阿来：《尘埃落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

接致使家族经济决策出现分裂。第二代之间代际矛盾仍在延续，聪明且能干的长子旦真贡布与被视作傻子的二少爷形成鲜明对照。当二少爷出人意料地创建边境市场并赢得民心之际，兄弟间的权力争夺将冲突推向白热化。二少爷的孩子诞生于土司制度衰亡阶段，象征着新旧时代交替背景下的身份迷失状态，其诞生既终结了土司血脉的纯粹特性，亦预示着封建家族制度的彻底瓦解结局。阿来巧妙地使家族代际冲突与历史进程相互呼应，老土司表征旧制度的顽固特质，长子象征改良主义的失败，二少爷以其超然态度见证传统秩序的荒诞本质，孙辈的混血身份更是宣告土司血脉异质化的终结。小说中这般层层递进的代际对抗，不但促使情节产生戏剧性发展，更将家族叙事提升至对封建制度消亡历史的深刻寓言层面。

3. 以特定空间展现家族生活

现代社会依然需要家族文化维系成员之间的血脉关联，一个家族曾经共同生活过的空间场域，在家族命运和集体记忆中起着重要作用。家族生活的特定空间将家族权力结构进行了具象化呈现，饱含着家族几代人的回忆，营造出家族独有的美学意味。

空间作为家族小说发生的环境，构建了家族历史的基本面貌。家族小说中的空间描写，仿佛是时间凝固后的怀旧性容器。很多家族小说作品用浓墨重彩的笔墨，描写宅院、祠堂等家族空间布局，将家族兴衰的过程具象化。《红楼梦》中的贾府、大观园等是小说叙事的主要空间，为故事情节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载体。小说第三回写林黛玉初入贾府的场景，通过林黛玉的视角描绘了贾府的奢华：“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①] 曹雪芹借助贾府大门的建筑布局和人物服饰，暗示了贾府的权势与等级森严。如果说贾府的奢华与内部的钩心斗角暗示了封建家族衰败命运的话，大观园就成了众人追求自由生活的具体体现。与贾府森严的等级和礼教相比，大观园却比较自由，众人在此可以卸下虚伪面具与身份意识， 从平时的压抑生活中暂时地解脱出来。大观园成为小说人物追求人性解放的诗意空间，许多故事发生在此也就合情合理了。同时，《红楼梦》中的空间环境还和人物性格、命运密切相关，恰当的空间描写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林黛玉住在潇湘馆，那里以竹子为主要景致， 这和林黛玉高洁、孤傲的性格十分契合。而薛宝钗所住的蘅芜苑则布置得朴素淡雅，将她的端庄稳重体现得淋漓尽致。沁芳闸的水流湍急，与小说中人物的情感流动与命运的难以掌握形成了互文。此外，太虚幻境借助虚幻与现实的交界，传达了一股浓郁的人生无常之感。《红楼梦》第五回这样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②]

空间可以看作是权力结构的视觉化呈现，家族小说空间书写往往体现了权力等级的存在。家族日常生活的空间，就是家族不同成员表演的舞台。作为家族成员居住之处，家族空间既是家族活动、仪式的承载时空，也是家族文化功能的记录者。家族小说里的空间书写，常蕴含着家族历史、传统与价值观。贾平凹借《秦腔》[③] 中夏家家

①〔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4 页。

②〔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 60 页。

③ 贾平凹：《秦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

族空间描绘，展现中国农村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文化冲突。夏家婚丧嫁娶、祭祀祖先等活动，皆在夏家大院开展，这一空间强化乐夏家家族成员的身份认同。小说对夏风与白雪在夏家大院举行的婚礼描写细致，婚礼流程、空间布置、参与分工等，体现夏家老一辈对传统礼仪的坚守。在夏家大院举行的仪式带有表演意味，夏家家族长辈借仪式来巩固自身地位。夏家老宅、秦腔剧团等，构成了家族成员共同记忆。受现代化浪潮冲击，传统家族空间承载的农耕文化、伦理道德渐趋瓦解，夏家老宅衰败、秦腔剧团解散、七里沟荒芜，显示出传统文化正在式微。《秦腔》凭借细致的空间描写，将情感表达视觉化，营造出浓郁的悲剧氛围。

家族小说的空间书写是家族群居生活场景的必然要求，通过建筑空间的细致呈现将家族命运与个体经历、时代变革统一起来，家族故事在特定空间中成为社会变革与民族历史的缩影。巴金在小说《家》[①] 中构建的高公馆就是封建家族制度与新思潮碰撞的空间，高公馆中的建筑结构与功能布局可以视为社会转型期矛盾的隐喻。从外部来看，黑洞式大门与石狮子构成一种威严的视觉屏障，门楣悬挂的“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暗藏着家族的礼教规训，而高家门内幽深的庭院布局则象征着家族权力的不可见性。同时，高公馆的空间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高公馆作为传统宗法制度的物质载体，高老太爷通过祠堂祭祖、族规训诫、丧仪筹备、婚姻安排等家族事务，将空间异化为礼教规训的现场。另一方面，现代都市文明的渗透使高公馆的空间功能发生变化。觉新在实业公司任职、觉民觉慧接受新式教育，则象征着现代文明对于专制空间的进入。小说中的花园空间既是觉慧革命启蒙、觉民爱情私语的自由天地，又是被封建家族权力空间挤压的边缘地带，鸣凤的死亡显示了自由理想在封建空间中的脆弱性。

4. 以家族经历发掘家族秘史

家族小说的创作离不开丰富的家族素材，而家族秘史是素材的重要来源。创作者可以从家族经历中挖掘素材，为故事增添真实质感与厚重底蕴。家族秘史包含着一个家族的爱恨情仇、命运沉浮，提供了立体鲜活的人物原型。家族秘史蕴含着隐秘却丰富的家族兴衰、传统变迁、社会变革、国家兴衰等思想内涵，发掘家族秘史及其背后的深刻主题，小说就能以小见大，反映出具有思想深度的时代风貌与社会变迁。

家族小说热衷于展现家族秘史，原因就在于这些家族秘史里镌刻着不同时期的重大事件、政治冲突、社会发展与文化心理。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②] 通过高密东北乡的上官鲁氏及其九个子女的坎坷命运，深刻地描述了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民间百姓的苦难。上官鲁氏嫁给了铁匠上官寿喜，因丈夫无法生育，导致上官鲁氏被迫与不同男性发生关系，并接连生下了八女一子。这个家族先后历经德军侵华、日军暴行、国共内战、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等，饱受历史与民族的苦难。上官鲁氏为了养育子女与孙辈，通过胃袋偷运粮食的方式进行哺育，上官鲁氏的身体变成了家族得以存续的依靠。

家族秘史中隐藏着人物成长的重要信息，为理解家族成员的选择和命运提供了新的理解。福克纳的代表性小说《喧哗与骚动》[③] 以美国南方没落贵族康普生家族为对象，借助几位家族成员对

① 巴金：《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

② 莫言：《丰乳肥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 年。

③〔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

于往事的讲述，揭示了这个贵族世家不为人知的历史。班吉明·康普生是一位智力障碍者，他残留的关于气味、触觉的感官记忆，无意中暴露了姐姐凯蒂失贞这一家族耻辱事件。长子昆汀在自杀之前在脑海中重现了凯蒂的婚姻悲剧， 出于对于南方贵族家族荣誉的偏执守护，他最终选择投河自尽。次子杰森冷酷而自私，他为了金钱对姐姐凯蒂的私生女小昆汀进行虐待与盘剥，最终揭开了这个家族最后一丝道德的遮羞布。黑人女仆迪尔西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完成了对于康普生家族秘史的全面回忆，也解构了各种关于美国南方贵族的美好想象。福克纳这部小说中的人物终生喧哗，叙述者从各自角度回忆了共同经历过的家族历史，折射出凯蒂失贞、淑女神话破灭、南方贵族社会土崩瓦解的残酷真相。

当家族秘史与社会变革、历史趋势以及国家命运等主题建立关联，便有可能使家族小说的思想含量得以深化。亚历克斯·哈里所著家族小说《根》[①]，将昆塔·金特家族七代人的命运起伏设定为叙事的主要脉络。作品借由对一个黑人家族秘史的挖掘，深刻地展现出奴隶制、南北战争以及民权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是如何对非裔美国人的集体命运加以塑造。小说起始于 1750 年，西非冈比亚曼丁哥部落的少年昆塔遭掳成为奴隶。他在北美大陆的悲惨经历，不单单是个体家族创伤的起始点，更是整个非洲离散族群的典型代表。昆塔女儿吉西被转卖，孙子鸡乔治于种植园艰难挣扎，曾孙汤姆投身南北战争参与解放，随着这样的代际交替，哈利巧妙地将家族私史融入美国历史的关键节点。金特家族七代经历了各种坎坷生活，也见证了奴隶拍卖市场上人性的泯灭，南方庄园经济运行的逐利，美国内战前后的社会撕裂与动荡不安。作家通过代代传承的家族记忆，在家族小说中建立了一套用于抗衡官方历史叙事的家族档案体系。哈里借助档案爬梳、历史研究以及前往非洲实地寻根，最终绘制了一幅完整的家族谱系。作家将金特家族的秘史提升到了一种方法论的高度，里面的每一位家族成员的遭遇，都成为解读美国种族关系、黑人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哈里借助这部家族小说向人们传达了这样一种理念，真正的历史并不存在于宏大叙事中，而是保管在被压迫者的代代相传的家族记忆里。当这些记忆碎片被重新排列组合，它们就可能勾勒出一个家族的历史面貌，更新整个国家的家族、种族记忆图谱。

家族小说创作以血缘关系作纽带，借由对两代及以上家族成员日常生活空间的描写、代际冲突的经历以及家族秘史的讲述，从而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与国家转型得以反映。写作者可依体裁长短、线索多寡，围绕血缘关系，讲述家族内外故事，并选取契合表现需求的创作技巧。

作者简介：

龙其林，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现象、转型期中国文化与文学等。

①〔美〕亚历克斯·哈里：《根》，郑惠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年。